

云南民族博物馆文库

YUNNAN MUSEUM OF NATIONALITIES BOOK SERIES

民族学与博物馆学



ETHNOLOGY AND MUSEOLOGY

谨以此书纪念云南民族博物馆建成开馆一周年

博物馆研究工作

(代序)

丘 实

浏览了本集的一些文章，想说几句话。

过去人们对博物馆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曾有较大的争议，本世纪 50 年代，确定我国的博物馆是文物的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当时有的部门就在实际上不承认这后一个性质，至于在民间，多数人不知“博物馆”为何物，不时还闹出一些笑话。现在，时过境迁，随着文博事业的发展，《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执行，文物知识的普及，人们不仅不再否定博物馆的存在价值，而且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地还纷纷要求兴建各具特色的博物馆。目前的状况是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水平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需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云南民族博物馆是座不满周岁的新建馆，连专业队伍都是非常年轻的，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大多数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这个馆的业务基础建设与馆舍的基本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既缺少必要的文物藏品储备，也不可能雄厚的人才储备，建馆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凭着青年人热情向上的一股朝气和较为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采取边干边学、在业务实践中进行培训的办法，不仅征集了上万件展品，而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布置出了八个专题、6000 平方米面积的陈列展览，于去年 11 月初第五届全国民运会在昆明举办时开了馆。万万没有想到，开馆时他们还拿

出了质量较高的《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品选》和《云南民族博物馆建馆专号》。现在，一本40万字的论文集又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必须有自己的特点，以有别于其他研究机构，否则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我觉得，作为文物收藏机构的博物馆，拥有珍贵而丰富的实物资料（文物、标本等）是它的优长，这是任何研究机构所无法取代的；其研究工作应以实物为基础，因为它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对它进行旁征博引的深入研究，远远超出实物本身的价值，这又是提高博物馆陈列展览水平的必要前提。

民族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应当以民族文物为基础。关于民族文物，文博界尚存争议，暂不深究。但是民族文物本身涉及各民族各时代所含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是各时代各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如果我们到云南民族博物馆的陈列室去参观，就不难发现，其展品内涵非常丰富，涉及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美学、伦理学、艺术和工艺美术以及天文学、医药学等等，真是包罗万象，值得我们用毕生精力去探求。我深为博物馆研究工作的大有可为而惊叹。

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本集子的内容还显得稚嫩，稚嫩中又有参差，毕竟作者都是文博战线的新兵。据说，该馆每年将编一本文集，一本围绕一个专题，名之为“云南民族博物馆文库”，借以培育全馆乐业勤业的精神，这一本内容庞杂了，但作为本馆研究工作起步的记录，还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还不能把它当作“记录”式的文集，对于从事民族研究和博物馆工作的同行来说，有的论点是很有见地的，篇文章都很有参考价值。这种评价，可能调子太低了，就云南民族博物馆的全面工作进行实事求是的衡量，其起点并不低，我衷心祝愿它事业有成，进而能独树一帜。

目 录

博物馆研究工作(代序)	丘 实
夜郎庄疏与笃慕	街顺宝 (1)
云南古哀牢地区青铜文化初探	李淳信 (15)
从文化的多元性谈彝族族源问题	赵国庆 (27)
南诏王室族属之争与唐代西洱河地区乌白蛮系属之分别	街顺宝 (38)
赫哲族族称小考	董菊英 (72)
张立道与云南	高 翔 (75)
哈尼族政治体制变迁轨迹	白玉宝 (79)
哈尼族哲学思想探索(一)	格 郎 (112)
红军长征过曲靖简述	毕发认 (131)
红军在滇东史料考证	天 元 (150)
试论《云南》杂志及其革命影响	黎 明 (182)
独龙江学校教育研究	李月英 (197)
傣族佛寺教育的社会功能	李海燕 (207)
论彝族原始宗教对民俗文化的渗透	赵国庆 (211)
自然环境与云南民俗	杨 莉 (237)
金华镇白族社区文化现象	杨松海 (245)
小凉山彝族父子连名制浅议	秋么尔布 (259)

少数民族服饰的文化意蕴	杨 莉 (275)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饰品及其文化内涵	蒋 贞 (290)
佤族服饰与传统文化	陈晓琴 (301)
大姚的彝族	李 宁 (308)
云南少数民族非正常死亡丧葬研究	王国梁 (314)
藏传佛教对迪庆藏族葬俗之影响	雪 域 (333)
文山峰岩洞人婚丧习俗及节日调查	李晓斌 (347)
秩序重构	
——云南文山州壮族布依支系	
丧葬礼仪及葬经考释	何杨波 (363)
赵藩楹句初探	段明明 (377)
临沧傣族刺绣佛幡的特色与源流	杨兆麟 (393)
云南民间瓦猫	吴松鹤 (407)
剑川白族民间舞蹈小析	杨 晓 (411)
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和现代生活	董 远 (418)
中国画的观念更新	张 萍 (422)
民族文物概论	高宗裕 (427)
锐意进取 争创特色	谢沫华 (440)
民族文物与民族博物馆	李淳信 (447)
民族学类博物馆藏品登记方法探讨	王平桥 (453)
略论云南民族文物抢救工作的重要性	木基元 (466)
浅论博物馆的社会功能	杨 冰 (476)
关于提高博物馆参观率的思考	余 鸣 (481)
彝族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	戴 江 (489)

夜郎庄蹻与笃慕

街顺宝

史籍所载，有说夜郎为庄蹻之后，但夜郎竹王传说，又说传于竹王，而竹王竹产，不会与庄蹻相关联。但又有说夜郎、滇以西都是庄蹻后裔。《华阳国志·南中志》有夜郎庄王墓，有文说夜郎庄王即庄蹻，但关于庄蹻的最早记载却又是说庄蹻沿长江而上，到滇池称王，绝与夜郎无涉。这些含糊其词，是是非非的记载，造成了经久不息、争而不决的学术论战。至于这些看起来很矛盾的记载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一定的联系，似乎没有人注意过。神话与传说不能等同于历史的事实，但必有其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是一一定事实的折射反映，除去历史覆盖在夜郎国表面上的积尘，这些神话与传说的真面目，也就呈诸人前——夜郎国是彝族历史的一段。

《史记》、《汉书》都说庄蹻征滇在楚威王时，但终威王之世（公元前339—329年），秦并没有取黔中，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取楚黔中，公元前275年，张若伐楚，取巫及江南为黔中郡^①，已在楚威王之后五、六十年，庄蹻拟已作古，故道塞不通，留王滇池是虚语。常璩、范曄可能注意到这一问题，就改作顷襄王时的事，但这时（公元前289—263年）巴蜀已并于秦（公元前316年），认

为不可能再沿长江而上到滇池地区，就改由沅水，出且兰到夜郎，并把牂牁郡得名附于庄蹻系船且兰，又忽略了《史记》及《汉书》的记载，牂牁别有一江，在夜郎不在且兰。《史记·西南夷列传》：“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又说：“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史记·南越尉陀列传》也说：“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是牂牁江即南盘江，至广东为珠江，牂牁郡由江得名，既与且兰无关，也与庄蹻无关，江名也当是由下游始，传于上游地区，夜郎称豚水，知非其所取之名，江名最先由唐蒙使南越而知，很可能是越人的称法，唐蒙等经营夜郎地区，只记旧名，故以名郡，《南中志》的解释，没有道理。即从沅水来，也不会无路返回，悼王时（公元前401—381年），吴起南平百越，归于楚国，且秦的势力也没有深入到沅水地区，既可以原路返回，还可以南行越地，再行返楚，并无阻挡。又说庄蹻取夜郎、且兰，称王却在滇，也没有交待清楚，司马迁说：“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又说：“滇小邑，最宠焉”，是对楚情有独钟而强调滇为楚后，并不涉及夜郎、且兰或其他地方。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庄蹻是沿长江而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于滇池，《汉书》少一“蜀”字，后人多以《汉书》为是，但以沿江上论，有“蜀”不一定错。沿江上，要过巴、蜀两国境，二国虽非强国，外敌入境，不会不闻不问，必有兵事，征服滇国，也需有超强兵力。唐蒙略地夜郎，兵才千人，食重即达万余人，其原因，《史记·平准书》说“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至一石”，转输困难所致。楚而至滇，更难唐蒙十倍，资粮于敌，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时代，没有可能性，若兵少，既难对付巴蜀军队的拦截，也不易攻取滇池地区；若兵多，《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外来人数一多，必然要对滇国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但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滇文化有明显的发展脉

络，并没有突然受到外界重大影响的迹象，这一点，云南省博物馆张增祺先生有专门研究，也认为庄蹻王滇没有考古学上的依据^②。《华阳国志·南中志》说王逊以五茶夷发夜郎庄王墓而讨灭之，《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姚州条引《华阳国志》说庄蹻“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返，遂留王之，是为庄王。”今本不见，以后文有庄王墓言，当是古本有此一节，以后人删改而不留。五茶夷既然围攻过建宁郡城（今曲靖市），又以发夜郎庄王墓罪之，则五茶即乌撒的异字，不会有误，地在今贵州威宁县一带，但看威宁中水、赫章可乐等地的考古发掘资料，也没有受楚文化重大影响的痕迹^③。夜郎人类起源的竹王传说，也否定了庄蹻王滇的可靠性。《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邛都、滇诸地都是侯王国以什数，都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说明这些地方都是同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然生存，自生自灭的状态，也说明不曾有过统治一方的庄蹻。综此，由楚国来的庄蹻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庄蹻（庄豪）当是以别的人物传说而托为楚人。

二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唐蒙）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华阳国志·南中志》说：“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史记》说：“汉武帝使唐蒙伐西戎，得夜郎国，遂立犍为郡。”今本《史记》无此文，但唐蒙入夜郎，是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故知犍为郡之设，确以得夜郎国地。“巴蜀笮关”一句，《汉书》无蜀字，《史记会证》说：“王念孙曰：巴笮关本作巴符关，《水经》云：江水东过符县，北邪东南，崱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注云：县故巴夷之地，汉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为中郎将，从万人出巴符关者也。是符关即在符县，而县为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关也，汉之

符县，在今泸州合川县西，今合江县南有符关，仍汉旧名也。”《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则是当初唐蒙经营南夷地区，长江以南都当作夜郎国地，《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十道志》说：“播州播川郡，秦夜郎县（疑“国”之误）之西（当为东）南隅”，当即本此，播州在今贵州遵义一带，知夜郎之地在其西。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也不能臣使也”，又说“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则夜郎南境当与南越相接。《后汉书·郡国志》牂牁郡谈指县出丹，注引《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有不津江，江有瘴气”，在《南中志》谈指为夜郎郡属县之一，当在夜郎县之南，靠近南盘江之地，也当即夜郎国南境。夜郎之地，北起长江，南抵南盘江，故唐蒙说夜郎可得十万精兵。

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漏卧侯俞，句町王禹交兵构恶，漏卧、句町两县俱属兴古郡，则夜郎王的势力范围当在牂牁郡西部而与益州郡相接。晋时宁州刺史王逊分牂牁郡作平夷、夜郎、牂牁三郡，平夷在北，夜郎在南，牂牁在东。《宋书·州郡志》夜郎郡治夜郎县离宁州（驻今曲靖市）一千里，牂牁郡治万寿县是一千五百里，朱提郡治朱提县是七百二十里，朱提县在今昭通市一带，一千里之地，夜郎县在今安顺一带。《后汉书·郡国志》说夜郎县出雄黄、雌黄，也与后世的情况相合，是汉设牂牁郡以后，夜郎王的中心在今安顺一带，郡县已设，夜郎虽封王，地域也受严格控制。当汉灭南越之后，先取且兰，再驱兵逼夜郎侯，使入朝，是当时夜郎王之居，尚在且兰之北。之前王于然、柏始昌等求身毒道，至滇，滇王问“汉孰与我大？”而夜郎侯也然，则夜郎侯居地当是在犍道（今宜宾）到滇池的往来路上。《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说，王逊以五茶夷发夜郎庄王墓讨之，五茶即乌撒，

说明最初的夜郎王居地及有关传说的发源地，都在今黔西北一带。夜郎王居地南移安顺一带，当与汉王朝势力的深入与压逼、限制有关。据《太平御览》卷166引《蜀记》说，远到长江以北的荣州也有竹王传说，且认为此地之人是竹王之后，立庙为祀，则夜郎竹王传说是整个地区的普遍传说，并非只限于部分地方。所以，虽有家族分支，分为几片势力的可能，但史载牂牁并无二夜郎王，则应该是王族中心南移，也不排除由于承继关系而导致的权力中心转移，而不会有两支人。

三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牁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祠是也。”《后汉书》及《华阳国志》都说竹王是汉武帝时人，且说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祠，则是把竹王当作夜郎王。但《史记》、《汉书》不载，唐蒙等人亲历，而司马迁与其同朝人，不会不知，也不会知而不言，竹王被杀及封子为侯等事也与史实不符。夜郎为王，一直未变，到成帝河平年间，尚有夜郎王兴。则是范晔、常璩以史载人物有限，只能推之最前一人，故托作汉武帝时人，实际上并不可靠。竹王传说，当是得于民间，是生人传说，而竹生人，非可靠，知是与图腾崇拜有关的纯粹的传说故事，有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存在的客观依据，但终非史实可比，托之前朝古代，尚有余地，定于某时某人，不可取也不可靠。竹王传说，当有更久远的历史，古老的渊源，讲的是人的起源，所以说这一传说的存在否定了夜郎

庄蹻的可靠性。

竹王传说，后来越传越广，成了跨地区、跨民族的传说，《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二桂州阳朔县“竹皇祠”条不仅录有竹王传说，还说：“今宁州始兴三狼乌浒，即竹王之裔，故有竹王三郎祠于此”，而今阳朔、三江、凌云等地，据刘介《广西土神简辑》说，尚有竹王庙^④。《华阳国志》、《后汉书》又说竹王被杀后，“夷濮（僚）阻城”，求立竹王后裔，于是颇有人认为竹王传说与壮侗民族有关。又有人认为夜郎侯多同，字意是苗语竹王，认为可能是苗语果雄的汉译音，而果雄又是苗族自称，也有竹的含义^⑤，语音对应，大概不会有问题，但要说多同即竹王，如前所述，并没有足够理由，倒是彝族谱牒中有“阿普多同”，有认为即夜郎侯多同，似更为可信。滇、川、黔、桂彝族也都有竹崇拜及竹生人的传说，日本学者君岛久子在《虚幻的夜郎国》一文中所录，得于威宁县彝族民间的三个故事，地点正在夜郎故地，无疑更有意义^⑥。彝文经中，更有祖竹、妣竹之说，人死后，把一丛山竹束作灵魂的栖身处，分男、女式保存，有认为这与传说的山竹救驾慕情节有关，也有认为是生于竹而归于竹的意思。彝族祖简称玛都，有认为玛即竹，都为出，也是生于竹而归于竹的意思，都与竹生人的传说有密切联系。

其实，竹王传说与哀牢九隆传说，都是一个故事的变体，《华阳国志》说“三节大竹流入足间”，与哀牢传说的沉木触沙壹，都有一样的寓意，是孕而生，非破竹而得人。《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蜀记》说：“昔有女子于溪浣纱，有大竹流水而触之，因有孕，后生一子，自立为王，因以竹为姓。汉武帝使唐蒙伐牂牁，斩竹王，因有此地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庙祀之。”这是竹王传说的异本，更接近于九隆传说。《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而孔明是“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由此可见，竹王与九隆传说的原本，都是龙生

传说，两者当是一个故事的变体，都来源于“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的南中夷人。附于永昌，附于通水，皆后人所为，当初的哀牢县并不在今保山市，但后人把许多传说都放到了这里，知妄加托附的也多。杨终《哀牢传》说“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态度比较严肃，竹王传说，附作汉武帝时，就不可取了。汉时的昆明人分布在滇西地区，但唐宋时贵州有昆明人，不能说两边的昆明没有联系，但在彝族传说及彝文文献中的记载，彝族是由东到西迁徙，而不是由西到东，说明从滇西到贵州的昆明人分布格局，早在两汉以前即已形成，只是司马迁等人分辨不清，就没有记载。九隆与竹王的地点又相距几千里，情节又有差异，才造成不同的解释，应该是由同一个传说演化出来的，并且最初的地点也都不会在后来的两地方中的一个地方，只可能是迁徙带来。

这种传说是贞女生英雄的神格，彝族民间故事中，这类的传说比较多。支格阿龙是龙与鹰的后代，是鹰血滴在其母身上而生；峨山不嫁女的传说，是交龙而生；昆明东郊撒梅支系彝族“粗糠宝”传说，其父是白石所化，等等，实质都是非婚生子，处女生子，如西方的圣母。只是不托为上帝天神，而是托于龙、石、木、竹、鹰之类的自然物的化身，异人异秉，生而英雄，都是同一神话类型，应该是共同文化的产物。而且，能把竹王传说与类庄蹻王真的传说联系起来的，也只有彝族的笃慕，唐人著作，多称“夜郎以西皆庄蹻遗种”^⑦，有人引以作其他的证据，但查之民族传说，又有谁知庄蹻，又有谁认是庄蹻之后，相反，川、黔到滇，彝族多传说是笃慕之后，《西南彝志》等载，六祖中的一些家系，势力发展到了滇西地区，在点苍山下发展基业，庄蹻换成笃慕，事实也就基本相符。徐中舒等老一辈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⑧，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楚无人至滇，那么，司马迁笔下的庄蹻的原形，应当就是笃慕，是由蜀而来的一支人，在滇东北地区分数支扩展

势力，分布于川、黔、滇广大地区。

四

笃慕在不同的记载中也作笃米、祝明、仲牟由、仲由牟，居木乌乌、曲木乌乌、觉穆乌乌、独木等，有译音异字，也有读音变异。民间传说，多说洪水泛滥，人类仅余笃慕一人，后得配仙姬，复又繁衍人类。但从六祖分支的史实看，仅余一人的说法显非可靠，《西南彝志》说追荐祖先武洛撮，但百事不顺，后文干脆说，天帝要消灭叟额与武古，笃慕因之遭厄运。其实就是说天所不佑，招来横祸，洪水恐怕只是一种委婉的借喻，笃慕逃难之后，其子六，分作三支，迅速扩展势力，重振旗鼓，再创基业，说明笃慕是遭难之后，携族外逃，全身而退。

六祖分支，长房武、乍两支到吐楚以南，中子糯、恒两支北迁，幼子布、默二支在实液中部立业。相同的资料，在成书已达500余年的《元史·地理志》中即有保存，该书于罗雄州条下说：“俗传槃瓠六男，其一曰蒙由丘，后裔有罗雄者居此，其孙普恐名其部曰罗雄”，有人误把这里的槃瓠当成了苗瑶系统的槃瓠，其实是把彝族六祖与《后汉书》槃瓠六男六女的传说相混造成误会。蒙由丘即慕雅切，同音异字，是武支的始祖。武定、禄劝一带，多称乍支之后，民族的谱牒与口头传说都十分确切，说明《西南彝志》的记载是可靠的。

《元史·地理志》于马龙、沾益、仁德诸条，都说其地系六祖后裔夺自焚、刺之手，有学者认为焚即白人，刺即罗罗，说非有据。《元史·地理志》马龙州及仁德府都说“昔焚刺居之”，是六祖后裔到此以前的事，沾益州条说“天宝末没于蛮，为焚、刺二种蛮所居，后磨弥部夺之”，唐代的磨弥部就是在沾益（今宣威）一带，《元混一方輿胜览》说：“沾益州，蛮名末迷”，知是未入石

城以前的居地，说明《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有误，当与马龙州条相同；说磨弥部来前有焚刺居住，是民族迁徙中的经历，以资料得于彝文文献，不能与汉文史料联系造成误解，说彝族赶走罗罗，自然不通。焚、刺当即《华阳国志》的濮、僚，《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都记载六祖后裔各支常与濮人、舍吐等接触，或战或和，且常有攻占濮人城池的记载。《元史·地理志》当是从这类彝文资料中获得资料，焚、刺不可能是精确记录，也不说明这些地方以前只有焚、刺，但这些材料说，六祖分支之前，六祖及笃慕及其先人并没有到过后来迁到的这些地方，武、乍之来，是第一次经营，攻城掠地才得扩展势力，说明笃慕遇洪水而自滇池地区逃难的传说不可靠，笃慕只能由蜀而来，而笃慕也即杜宇，两人的许多经历都很相近，有人说二人为同一人^⑨，不无道理。

杜宇在蜀，曾建赫赫功名，“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⑩，雄极一时。彝语皇帝叫“我姆”，意为至高无上，这一名称的存在，说明彝族历史上有过绝对权力的最高首领。但秦汉以后的彝族历史，都受外族统治，并没有出现“我姆”这类词汇的可能，南诏也只是“夷语谓王为诏”，没有皇帝的概念。彝语称王作兹、且、诏，既有译音用字差异，也有方言间的差异，今禄劝一带的汉姓王姓，彝语称阿兹，是汉语彝译，王与皇帝是有明确的区别的。追溯彝语皇帝一词产生的历史，只能在先秦以前，杜宇称帝，无疑是追寻的方向。

《华阳国志》及杨雄《蜀王本纪》都说杜宇是以鳖灵治水有功，自以为德才不如而禅位于他；但杜宇归隐西山、魂化杜鹃、子鹃啼血等与杜宇有关的传说，说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杜宇事件是一桩互相颠覆的悲剧，而不是美满的结局。当时的社会，是宗族制的社会，不可能以一人之力解决争端。蜀国历史上，杜宇以前

的蜀王蚕丛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蚕丛国破，子孙散居姚嵩等处”^①，部落相争，败者逃，胜者王，鳖灵既称开明氏，则也不是只有一人，杜宇的经历与蚕丛相类，都是败走，笃慕六子又迅速重振雄风，则是带有大队人马。由此看，说笃慕就是杜宇，不会有多少问题。而司马迁却正好把这件事说成庄蹻由楚来征，正是由于不是楚庄蹻，竹王传说及九隆传说一类自发的传说才由他们带到各个迁徙而至的地点，本来很正常的事情，由于司马迁说成楚国庄蹻而矛盾百出，不可为解。

五

六祖分支基点的楚吐，实即汉代设县的朱提，同音异字，彝文资料与汉文资料，所指都在今昭通市一带，说明汉之设县，即本于彝语原有地名。《汉书·地理志》已载有朱提县，则不仅六祖传说可信，且也甚早，与彝文文献中六祖分支的时间相对应。紧邻朱提的堂狼、邛马邑两县，也为彝语地名，堂意为松树，狼意为谷地、坝子。邛马邑，《说文》字作存马邑，但说是犍为郡属县，没有释字意，说明是地名译音，不重于字，加邑旁是以为其为村邑而为之；邛彝语意为村、寨，马邑意为大，合之即大村子、大寨子的意思。《华阳国志·南中志》在存邛马邑县条下说有雍无梁林，雍闿造反，系马于山，久之而系马桩长成林，故名。有版本说：“无梁，夷言马也”，有人依此认为无梁与缅语的麦浪（马）最为接近。但从文意看，是系马桩成林而非马成林，无梁不可能只是一个词，《彝族简史》释“无”作马，释“梁”作系，才是恰当的解释，与地名存邛马邑联系，说明彝族在这里活动的时间极久远，势力也大。

有人认为夜郎的夜是词缀，主体是郎，而郎即僚，为百越一支，这不过是信口为说，并无道理。夜郎去夜为僚，且兰去且，堂狼去堂，难道也都作僚，显然不可靠。《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且兰君恐远行，旁国掳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起兵即杀犍为太守，说明且兰离当时的犍为郡治牂县并不远，王逊分牂牁作三郡，平夷在北，夜郎在南，牂牁在东，平夷郡的平夷县在西，牂县在东，且兰又在牂县之东也。《宋书·地理志》说牂牁郡治万寿县是晋武帝时立，则当是分原来的且兰县立，万寿县距宁州（今曲靖市）1500里，两县相邻，当都在今贵阳市及附近一带。且兰字也有作苴兰，注音子余切或千也切（《说文》），在彝语方言中，有[k]、[kh]、[tɕh]等声母混用的情况，如村、寨，有且、扯、卡、戛等读法，贵州彝文古籍翻译中，人名的策举祖也作策耿纪、策更苴、慈举祖，举侯也作古侯、耿恒^⑧，依此，我们可以说，且兰也就是彝称的古牯（今贵阳），且兰的地望就是在现在的贵阳市一带。《汉书·地理志》说牂县有不狼山，方国瑜教授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定牂县在今大方、黔西、织金、纳雍诸县地，可信。至宋代，与广西进行贸易的部落中，罗殿方向有毗那，至清初吴三桂攻水西，改土归流，比刺是水西三大要地之一，三个地名，前后1000余年，但地望相同，说明是地名译音异字，牂与毗那，比刺，那（刺）是坝子的意思，并不冲突，地望在今织金一带。

贵州省博物馆在清镇、平坝、安顺、赫章、威宁、黔西、毕节、金沙、兴仁、兴义、道真、务川、沿河、习水等地发现两汉墓葬1000余座^⑨，除道真、务川、沿河外，都在贵州西部，说明汉设牂牁郡，主要就是在彝族先民活动地区，与上述遗留的彝语地名和彝文文献资料相对应。

昭通有传世的彝文“以诺”印章，铜质，蛙纽，汉译作“印章交以诺用”^⑩，还有一枚印作“妥鲁山里守辖印”，形制古朴，同于前印，此印目前仍保存在私人手中，据说两印都是由威宁出土，流入昭通。在昭通、镇雄、威宁等地，仍有许多以“以那（诺）”作基本词的地名，《镇雄县地名志》解释，以那是彝族家支名称，